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簡介

紹銘譯

譯自 Palo Alto Time, October 7, 1964.

珍藏稀世文獻價值連城

設在史丹福大學校園內的「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雖然不會被珠寶竊賊或銀行劫匪光顧過，但是在研究所地下室有兩個房間却被嚴密防護得有如銀行的金庫一般。

這兩個房間僅有的兩套鑰匙交由最親信的人員保管。任何人進入房間之後都得立即把門反鎖。室內若有兩個人，而其中之一要外出片刻，出去之後房門仍舊又被鎖緊。

雖然大多數的銀行劫匪對這兩個房間中所儲藏的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珍貴的物品，事實上，這兩個房間確是價值連城。室內收藏的大批圖書、報紙和小冊子大都是明日黃花，而且，除了外交專家之外，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這批文獻遠較銀行金庫所儲藏的更為珍貴。是胡佛研究所收集品的精華——收藏品總值美金兩千五百萬元，這些文獻對學者和史家而言却是無價珍藏。

例如：室內藏有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和亨瑞克·希姆勒(Henrich Himmler)的日記，一本為呈獻給希特勒而特製的奇妙的手造紙印成的書和蘇俄真理報和消息報的創刊號等等。

在二百八十五英尺高的胡佛塔(Hoover Tower)裏總計收集了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大戰發生聯帶發生關係的四千萬件文獻和參考資料。

這個研究所獨家擁有現存的有關現代共產主義、納粹主義、社會主義和侵略的國家主義革命的最完備記錄。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簡介

在胡佛研究所裏藏有絕對機密的資料，諸如帝俄沙皇秘密警察的檔卷和為數六萬份有關蘇維埃奴工系統的最詳盡記錄；此外，如弗瑞德圖書館(Alfred Fried Library)有關促進和平的兩千五百件特別收藏品。

另外，還擁有有目前仍活躍在世界舞台上的三百位風雲人物的資料，他們把自己的私人記錄送到胡佛研究所，請求代為保管。

這一切一切的收藏是相當偶然的，當一九一四年史丹福大學的畢業生魯伯特·胡佛(Harbat Hoover)前往歐洲的時候，這一位成功的礦冶工程師當時正要開始去做救濟工作，這是他首次從事的公職，後來因他的成就而登上美國總統的寶座。

在一艘前往歐洲的輪船上，胡佛讀到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校長安德烈懷特(Andrew D. White)的回憶錄。懷特的書上談到由於原始資料的散失，使他在研究法國革命時遭遇諸多困難。這段敘述給胡佛的印象很深。

蒐集史料捐資建立圖書館

胡佛決心不使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記錄重蹈覆轍，他開始儘可能地搜集各種資料，並且把在歐洲各處的朋友們的協助列表彙編。

當他在比利時組織救濟委員會的時候，他把收集軸心國和協約國雙方有關大戰文獻的工作，列為委員會半官方職責的一部份。

稍後，胡佛由歐洲返國，担任美國糧食部部長，他運用他職務上的方便，更進一步地繼續努力於資料文獻的收集。

但是，當他在一九一八年重返歐洲就任盟國救濟總署署長的時候，才是他收集資料工作真正的最好機會。

由於這項工作的進行，有人形容胡佛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搬藏鼠」（Pack rat 北美出產的一種鼠，有搬運和儲藏小物件的習性），他解釋說：「因為每當胡佛發放一頓食物，他要收走一磅史料。」

把胡佛比成搬藏鼠的是史丹福大學的校長瑞·李曼·韋爾伯博士（Dr. Ray Lyman Wilbur），他曾協助胡佛組織了一個學術委員會前往歐洲收集戰爭資料。

胡佛首先以五萬美金資助這項創始的研究工作，這筆款項迅即告罄，他立刻又撥下美金十萬元。

到了一九二一年，在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大戰資料收藏室」（Hoover War Collection）總共收集有八萬件文獻，由於這批資料太多，不久，史丹福大學圖書館已無法把它列為「特別收藏」了。

史丹福大學在一九二二年將這批特別收藏品命名為「胡佛戰爭圖書館」（Hoover War Library），並且把史丹福圖書館的一整列廂房撥出來，專供貯藏這批文獻。

這個機構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廿日遷入新建的胡佛塔（Hoover Tower）。

胡佛塔的建構費用耗去了六十萬元美金，款項來自許多無名氏的捐獻。據估計，這項建築和裝設費用，以現在的價格來估價，要值上美金六百萬元。

今天，這個高達十四層的塔樓仍舊嫌小。成箱成箱的書籍疊床架屋似地都堆積在地下室中，等待工作人員在塔樓裏為它們騰出存放的位置來。

當然，總得有個補救的辦法，在塔樓旁邊的一塊空地上即將興建一座價值一百六十五萬美元的新建築。這項新工程將在一九六六年底完成，以容納胡佛塔已經容納不了的一部份圖書。

同時，新的文件源源湧來，每一份寄來的郵件都為胡佛研究所帶來一些新的東西，工作人員仍然不斷地努力訪求新資料。

有些文獻帶來頗費週章，神奇無比。前面提到的俄國秘密警察歐克拉那（Okhrana）的檔卷就是一個好例證。

共產黨人認為沙皇秘密警察的整套檔卷已在一九二四年被焚燬。按理說，沙皇派駐法國的最末一任大使巴撒耳·馬克拉可夫（Basil Maklakoff）向共產黨人發誓，在從巴黎的歐克拉那總部取出檔卷之後，他已親手將這批

文件焚燬。

事實上，馬克拉可夫早將這批珍貴的記錄秘密地雇船運往史丹福。假若俄國人偵悉他的這項行爲，他將有喪失生命的危險。因此，這批檔卷被史丹福大學封藏在箱子裏。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馬克拉可夫去世，三個月之後，研究所方始將之公諸於世。

有時候，研究所不惜鉅資收購某些資料。譬如說，研究所曾經以四十萬美元收買了一批有關中東地區的私人藏書。

研究所亦會以意想不到的廉價買到極其珍貴的史料。有些資料是免費贈送的。

一九三二年抵抗日軍，保衛上海的中國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將軍就會以四百美元的代價把他藏有的一批貴重資料賣給研究所，比它應值的市價低得多。當他接受那四百元時，他說：「我認爲我實收的款項和市價的差額就是我對胡佛圖書館的捐獻。」

濟濟多士，從事學術鑽研

胡佛研究所裏的資料，主要是供給學者們和研究工作的人員使用。通常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外文；看得懂外文的人，通常又沒有耐性去讀那千百頁的文件。

但是對那些有興趣而又有能力做學問的人而言，胡佛研究所裏的資料雖然枯燥，却有着無比的助益。

威廉·席勒（William Shirer）撰寫「第三帝國的興亡」時（*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大部份的史料來自胡佛研究所的檔卷。白倍拉·土克曼（Barbara Tuchman）使用這裏的資料寫成他的「八月的槍」（*The Guns of August*），這兩本書出版後都是洛陽紙貴，暢銷一時。

曾經一度在俄國擔任臨時政府主席的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曾經在胡佛研究所裏鑽研四年，寫成有關當年俄國臨時政府的三卷巨著。

由世界各地前往史丹福大學，利用胡佛研究所存檔的資料做研究工作的高級研究員，平均每年達三百人之多。他們來自歐洲、亞洲的一些著名學府和美國的五十所大專院校。

一般人看不懂，而又枯燥艱澀的原始資料，經過專家學者們的處理之後，寫成的書，連張三李四都讀得興味盎然。

舉個例子：分析希姆勒的日記時，研究所的副主任斯華拉科斯基博士會經這麼解釋：「希姆勒早年對宗教信仰至極虔誠，根本想不到他日後會領導恐怖的『蓋世太保』和祕密警察。但是從他的日記裏，我們看得出來，他年青時在情場上頗不得意，這對於他之所以轉變成為『蓋世太保』頭子，可能有着心理上的影響。」

歐克拉那的檔案對歷史的發展提供了某些方面的啓示。對俄帝祕密警察殘酷的刑訊方法有着詳盡的記錄，這與繼承了歐克拉那的共產黨祕密警察目前所使用的辦法如出一轍。

這批檔案揭露了史達林首次被捕的內幕詳情，對歐克拉那的通緝和有關托洛斯基的記載。

祇要是做適當的學術研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研究所收藏的資料。但是，有時候，資料也被運用於學術研究範圍之外。

一九四二年，當美軍決策人員開始採取軍事行動的時候，胡佛研究所接到一項急電，查詢研究所裏是否蒐集了北非海岸的地圖。

在檔案裏一查，找出一整套這種地圖。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位法軍將領的遺孀贈送給研究所的。這位已故的法軍將領會是胡佛的友人。

這幅成為集結在北非海岸外龐大的美軍部隊所僅有的一套地圖，精確地指示出當地海岸附近海水的深度。這對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馬克·克拉克將軍（Gen. Mark Clark）揮軍登陸北非的行動有着無可估計的貢獻。無疑地，也減少了美軍官兵的傷亡數字。

當然，能把胡佛研究所裏的資料運用得這麼出神入化，機會並不很多。對大多數的學者來說，這裏有着重要的歷史文獻，可以成年累月地供他們隨意運用。

宗旨目的、仁智互見

當胡佛塔樓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舉行竣工典禮時，霍伯特·胡佛致詞中指出：「成立這個研究所的宗旨，在於促進和平。」

但是，關於這個研究所到底負着什麼任務，近年來已在史丹福大學裏引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簡介

起爭論。

一九六〇年出版的一本為研究所募集基金的小冊子裏有胡佛的一篇文章，他自己就提出了與先前不同的說法，其中有一段他這麼寫：「以研究和出版為手段，這個研究所的目的必須是揭露馬克斯學說的邪惡本質——不論它出諸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濟的唯物論或是無神論的形式——而保衛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使之免於遭受這些邪學、陰謀的危害，並進一步積極地重新證實美國制度的正確性。」

這段話在學術界裏引起了很多評論。「史丹福日報」立即著論予以駁斥。社論指出：

「胡佛研究所沒有權利去預先決定學術研究的目的。除了協助那些有資質的學者去蒐集必需的史料，以形成他們自己的見解之外，它不應該有其他的『宗旨』或『目的』」。

主持研究所，使之成為史丹福大學中的一個獨立機構的校方人員答覆說：「我們期望大學傳統上至高無上學術自由能普及於整個史丹福大學。」

不過，在以校董會名義發表的一篇文告中，校董們強調胡佛有權利表示他的上項見解。文告指出：

「校董們確信：由於胡佛先生創辦了這個偉大的研究機構，而這個研究所又以自己的名字被命名；因而，將胡佛先生的願望和期望列入校方的正式記錄，以之為研究所所在決策上的優先考慮，而不發生決定性作用，此舉純屬適當，並無不妥之處」。

「新共和」雜誌的一篇社論會提及研究所主任坎伯爾博士。雜誌稱坎伯爾為「右翼的經濟學家」，並且說他是「胡佛個人的，也是唯一的研究所主任人選。」

雜誌說：「坎伯爾會強調他信從胡佛的宗旨，並且表示他願意在推動研究所的工作上實現胡佛的願望。」

坎伯爾否認了這項報導，他對他之被任命為研究所主任的經過有所解釋，他說：「史丹福大學的校長事先需要徵得胡佛先生的同意，然後向校董會提名推荐一位研究所主任的人選，最後，由校董會決定這項任命。」

「至於談到我自己，史丹福大學的校長寫了一封信給我，問我是否願意擔任這項工作，我欣然地接受了。」

「當然，由於我對胡佛先生為政府服務五十年的卓越記錄一向是至深景慕，無可諱言地，我非常高興胡佛先生也能同意這項任命。」

有關他自己對「共產主義和其他主義」的見解，坎伯爾說：「因為每一個人都主張言論自由，我確信每一個人都會同意：我有權堅持自己的見解，正猶如史丹福大學任何一位教授都有權堅持他自己的見解一樣。」

坎伯爾強調表示：「當研究所人員，包括主任在內，討論公共事務問題的時候，他們並不是為胡佛研究所發言，而是為他們自己講話。這是可以理解的。」

從胡佛圖書館到胡佛研究所

「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主任是W·格倫·坎伯爾博士(Dr. W. Glenn Campbell)，一位哈佛大學出身的經濟學家。

一九五九年當他受命接長這個研究機構時，年僅三十五歲。是該所歷來最年青的主管。接長胡佛研究所以前，坎伯爾博士曾任設立在華府的一個政府研究組織「美國企業協會」(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主任。

一九六四年大選期間，坎伯爾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高華德參議員的競選顧問之一。為了替高華德籌劃競選事宜，他一直忙到十一月三日大選之後方才回到研究所去。

副主任韋鐸德·斯華拉科斯基(Witold S. Sworakowski)是一位曾在羅馬尼亞、奧國和波蘭受教育的羅馬尼亞人。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他曾擔任波蘭的外交官員。

斯華拉科斯基於一九四七年前往史丹福大學，負責胡佛研究所的東歐資料部。他對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歐洲與國際共產主義深有研究，在這方面會經出版好幾本著作，並會發表很多論文。

坎伯爾是胡佛研究所的第五任主任，先前的四位是：亞當斯博士(Dr. E. D. Adams)——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羅爾夫·魯滋博士(Dr. Ralph H. Lutz)——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四年；哈洛德·費雪博士(Dr. Harold H. Fisher)——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二年；依斯頓·羅斯威爾博士(Dr. C. Easton Rothwell)——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九年。

落成將近二十五年，面積七萬五千平方英尺的胡佛塔，今天已經無法容納仍舊不斷湧來的大批資料，一所新廈不久將在塔樓鄰近的一片空地上出現。

賓夕法尼亞州匹茨堡城的一位亞倫·史凱菲夫人(Mrs. Aleta M. Scaife)捐贈了七十五萬美元，使得新廈能於去年五月一日奠基破土。胡佛研究所的負責人員預計將從其他方面籌募捐款，湊足建構這棟新建築所需總額一百六十五萬元的經費。

新廈將有兩層地下室以供儲藏各項資料，地面以上另有兩層容納辦公室和更多的藏書。

霍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自己的檔案記錄存放在胡佛塔的第九層，包括與胡佛一生事業有關的幾個機構與一些人物的記載。

有六名管理人員專門負責保管這批檔案。

這些有關機構中，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救濟組織，例如比利時救濟委員會和美國救災總署。

胡佛的案卷裏，有一批資料有關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及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間，在胡佛委員會主持之下的美國政府改組工作。

另外還有一批為數一百五十個人的個人檔案資料，這些都是會與胡佛共事、或追隨過胡佛的人。

維持胡佛研究所，每年需要八十萬美元的經常費，這筆款項之中，有半數以上是自由樂捐。

其餘的款項來自一筆捐贈的基金，和由史丹福大學撥出，每年至少十二萬五千元的專款。

在每年支出的八十萬元中，比半數稍多一點，是圖書館設備的維持和工作費用。另外有不足四十萬元，消耗在研究工作上面。

胡佛塔樓是由史丹福大學負責維持，而胡佛研究所是屬於史丹福大學系統中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

史丹福大學校董會決議：研究所主任向校長及校董們負責下列四項工作：

- 一、指派並監督研究所所屬人員從事各項工作；
- 二、指導並監督研究所圖書館之業務；

三、指導並監督研究所的研究與出版計劃；
四、草擬並執行研究所之年度預算。

一個由五十六位來自全國各地傑出人士組成的顧問委員會負責對研究所作政策上的建議，並且協助維持研究所的最佳利益。

每年有成千的人前來參觀胡佛塔，但是他們之中絕大多數的人所來並非讀書。

他們搭乘電梯直上二百八十五英尺高的塔頂，俯瞰中半島的風光和史丹福大學校園的全景。

他們來此也是為了觀賞陳列在圓形大廳裏的紀念物，和擺設在亨利·胡佛室（Lou Henry Hoover）中，由胡佛夫人蒐集的珍貴藝術品，以及胡佛夫人對和平與人道主義運動所作貢獻的記錄。

霍伯特·胡佛室不久即將開放，這個陳列館的位置是在圓形大廳的一側，與亨利胡佛室遙遙相對。它將陳列一些與前總統胡佛一生服務政府有關的功勳榮譽和紀念物品。

胡佛塔樓每星期一至五由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四十五分開放，供人參觀；星期六的開放時間是上午十點至下午四點三十分，星期天是由中午十二點半到下午四點。亨利胡佛室在同一時間開放，星期日是關閉的，可是，透過門上的格子窗，人們仍能窺見室內陳設的全貌。

史丹福的校友們似乎在處理驚險緊張的場面上都各有一套。

至少，他們經常都是警覺地而又能幹地運用他們的聰明智慧，將有價值的資料設法由敵國政府取來，交到「胡佛戰爭、革命、和平研究所」的手裏。

舉一位少女為例，她是史丹福大學新近的畢業生，為了她的安全，在這裏姑隱其名。

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統治的革命進行了七年，直到一九六二年方始結束。這段期間裏她任職於坦吉爾（Tanger）。胡佛研究所的人員與她取得了聯繫。

由於法國當局不肯公佈那些阿爾及利亞革命軍所發行的小冊子和文件，而研究所人員認為那批資料又正是有關現代世界革命運動所必需蒐集的，因此，他們需要這位小姐協助。

這位女孩子自願擔任這項工作，她曾經三度秘密潛入法軍陣地，並將收集到的資料轉寄史丹福大學，藏進研究所的櫥櫃裏。

一位畢業於一九三五年的史丹福大學學生阿瑟·賴特（Arthur Wright）也會為研究所的收集資料工作作了特別的貢獻。在他妻子瑪莉的協助之下，他曾在於一九四五年為胡佛研究所收集了重達九千磅，有關中國的文件。瑪莉後來成為研究所裏中國資料的負責人。

當日軍攻佔北平的時候，賴特夫婦正在當地求學。北平被中國軍隊光復以後，他倆接到史丹福大學的一個電報，要求他們幫忙蒐集有關中國的文件。

他們曾經搭乘過運送蔬菜的板車，也會搭乘軍用飛機，利用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賴特夫婦為了蒐尋文件而旅行於中國各地。他們寄回研究所的大批資料中，甚至包括被用來包裝裝菜的有價值的舊報紙。

現存於胡佛研究所的資料中，有許多多書籍和報紙，都是在同樣的情況下，被人們由垃圾堆中揀出來的。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一九二五年的日記，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是在宣傳部的後院裏被發現的，發現時這本日記被扔在地上，火燒過，水也浸過。

一九四六年，胡佛研究所派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前往歐洲訪尋各項有關資料，他在德國一個堆積垃圾的地方，找到了另一批珍貴文件。

勒納發現了成卷的桑得登斯特·席豪斯（Sonderdienst Seehaus）的檔案——納粹宣傳工作的記錄——居然被丟在垃圾場的一個泥潭裏。他對垃圾管理員偽稱美軍總部需要這些破紙去包裝箱子，於是，花了六塊四毛錢把全部成套的記錄買了下來。

這並不是說對胡佛研究所所有貢獻的人全都跟史丹福大學或研究所所有着關係。有些只是對保存舊卷深感興趣的學者，有些是只想賺錢的書店老闆。

也有一些人，當他們開始蒐集這些文件時，根本不知道有個胡佛研究所存在，有一位曾在漢城日軍總部做事，姓辛的韓國人恐怕就是這麼一個例子。

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美國投降。日本人燒燬全部文件，撤離漢城。但是，百密一疏，他們把那個姓辛的韓國人忘了。多年來他一直是偷偷地把各項文件拍成照片，然後把底版埋藏地下。

一位美國紅十字會的人員聽說這回事，要求他把這批底版送給研究所。他不肯。但是，他說，假若送給他足夠的攝影設備，他願意拍兩套，一套他自己保留，一套給研究所。

他們果真將印像紙和顯影用的化學藥劑整批運往韓國。依照約定的時間，辛先生把他影印的資料悉數寄抵史丹福大學。

有的時候，一些極為珍貴的資料是在非常神祕的情況下抵達研究所。在一九三六年的某一天，一位年青人突然出現在史丹福大學，送來一個用黑布包緊的包裹。一張便條貼在包裹上，寫着：「一九五〇年元旦以前請勿開啓。」

最後，當這個包裹被拆開而公諸於世時，裏面存放的赫然是在一九一九年主持偵訊布爾希維克黨人謀殺帝俄皇室案件的白俄官員的檔卷。

這些資料具有極端重要的價值，研究所的人員真是喜獲至寶。但是時至今日，仍然沒有人知道當年把這包東西送到史丹福來的人到底是誰。

早在第一次大戰時就開始收集有關資料的霍伯特·胡佛本人也有這種戲劇化的經歷。

有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當他正出席波蘭政府的一個接待酒會時，一個在波蘭共黨政權裏工作名叫米柯拉茨克（Stanislaw Mikolajczyk）的反共人士，把厚厚的六大卷東西塞在他手裏。

「我們奉命給你一些紀念品，歡迎你到波蘭來！」那位官員解釋說：「這是我給你的一份。」

米柯拉茨克的「紀念品」竟然是被懸賞緝查的波蘭地下反共組織的報紙。當他聽到要在接待酒會裏向胡佛致贈紀念品時，他機靈一動，想到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良機，可以在共產黨人衆目睽睽之下將這批報紙傳遞到自由世界去。

眼看着胡佛接受了這批報紙，憤怒的共黨官員却是無可奈何。一年之後，米柯拉茨克被迫逃離波蘭。

有些情形之下，胡佛研究所的資料倒是真正正地從地下挖出來的。在納粹佔領比利時期間，胡佛的一個比國朋友在樓梯上開了一個縫隙，按期地把比利時地下反納粹組織的出版品投進裂縫裏。

戰後，研究所派人把樓梯拆掉，從底下挖出大量這種地下組織的刊物。

今天，這批刊物和其他許多由敵後走私過來的，用照相器材秘密拍攝下來的，以及由泥污不堪的垃圾堆裏找出來的資料都一起神氣地站在胡佛研究所的書架上，供千千萬萬學者參考研究。

——上接第38頁——

及指使僑新華社駐肯亞記者王德明策動左傾青年，進行顛覆工作；如對馬拉威，共匪先收買該國外交部長齊伍美，然後再由齊伍美申通司法部長契爾瓦、發展和住房部長布瓦腦西、內政部長契西薩、勞工部長蕭卡尼、教育部長彭貝，參與顛覆活動；此外，又有運用左傾政黨領袖和失意軍人共同進行，如對桑吉巴，共匪先收買桑吉巴左傾的烏瑪黨領袖巴布，委其為僑新華社駐桑記者作掩護，再由其聯合會在莫斯科受過共產訓練一度出任桑吉巴總理的漢加與桑吉巴軍方實力派首領約翰·奧克洛，共同進行顛覆工作，卒使其建國所謂「桑吉巴人民共和國」。

對於未獨立地區的顛覆工作，共匪是支援該地區之所謂民族革命份子，反抗白人政府，脫離殖民統治，實施自主獨立，如支持安哥拉的革命份子羅敦·羅伯特與安拉德反葡，莫三鼻給的革命份子蒙德拉納反葡，支持南非革命份子約翰·馬克斯反對白人韋伍德政府的統治，企圖將各該地區的白人政府推翻，另建親共政權。

我們清楚：非洲國家新近獨立，百廢待舉，必須爭取與國，廣建國際關係，始克廁身國際政壇，同時又以經濟基礎脆弱，亟需外力援助，以求經濟發展，共匪於是乘機而入，除對其獨立致電祝賀，僞示友好，誘其與匪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并伸出援手，對其提供經濟援助。但共匪誤認非洲國家與匪建交與接受其援助，即係親匪，竟而得寸進尺，在其駐非洲各國僑大使館內潛伏大批特務份子，暗中進行顛覆工作；利用派遣技術專家進入受援國進行滲透活動；利用經濟援助，壟斷受援國經濟發展，甚至以武力金錢支持各該國之在野左傾政黨與叛軍，發動政變，將其現政府推翻，另建共產政權，以致與匪建有邦交國家之政府及其首長，人人自危，不能不採取有效行動，謀求自保。蒲隆地、中非、達荷美三國先後與匪絕交，馬拉威、象牙海岸、尼日、突尼西亞、蘇丹等國元首嚴重譴責共匪滲透顛覆，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對匪提出警告，則為有力證明。（完）